

九十忆旧

○赵仲兴（1942化工）

1919年我生于沈阳，在那里读了小学，毕业后进了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住宿在学校里。1931年我12岁，二年级刚开学不久，9月19日早上起来觉得跟往日不同，住校的同学三三两两在窃窃私语，学校大门紧闭，走读的同学都没来。我一打听才知道昨夜日本鬼子炮轰了北大营。学校便停课了。

日本人占领沈阳后又横扫整个东北，人们争先恐后往外逃。我搭乘一班刚刚修复的火车到达了天津。1932年春，天津局势稍微稳定，学校复学，我进入觉民中学，插读一年级春季班。1934年在觉民中学毕业后，又到通县潞河中学读高中。

1937年7月，我们一些毕业生留在学校内温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约7月10日左右传来卢沟桥鬼子攻打宛平城的消息。于是大家都各自回家。7月底得到大学继续举行招生考试的消息，我赶回北京城里西单皮裤胡同的复兴公寓（包月小饭馆），参加了清华大学体格检查，继续复习功课。但是过了几天，又传战事不利，日军将在8月3日进入北平城。我赶快收拾行装，第二天坐电车到火车站，在西长安街上竟遇上日军队伍，电车停下来。我坐在车上看着鬼子兵列队行进，心里嘀咕着：北平完了！

在其后的数月中，我颠沛流离，辗转天津、青岛、济南、南京、汉口、宜昌，于1938年1月到达重庆，借住在姑父家。8



赵仲兴学长近照

月，教育部组织统一招生考试，我经考试被重庆大学录取，读化工系，系主任为傅鹰，化学课教师为孙增爵。

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招收插班生，我被录取了。1939年10月，我由重庆赴昆明进入向往已久的西南联大化工系。系主任为张克忠，后为苏国桢；系内教授有：谢明山（化工机械）、潘尚贞（发酵工业）、陈国符（造纸工业）、张明哲（石油工业）。二年级主要读专业课程，如有机化学（朱汝华）、定性分析（邱中岳）。三年级后，到拓东路的工学院读机械、电机工程方面的课程，其中孟广喆先生的静动力学每两周一次小考，这一关是最难过的。

1942年在联大毕业，我去了重庆动力油料厂工作。该厂归资源委员会化工组管理，用桐油做原料，生产柴油、汽油、润滑油供作军用。

□ 值年园地

1949年全国解放，一个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的新世界诞生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醉啊！我们办壁报，唱解放歌曲，热血沸腾。不久，进入1950年，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开始了，令人不知所措。

1959年1月，我所在的化工厂领导匆匆跟我说，要调我到西北的原子能厂，征求我的意见。这事很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我不是党员，怎好到这种绝密单位去工作呢？但我知道既然领导作出了决定，怎么能拒而不去呢，我当然说同意。要搞原子弹我一窍不通，于是赶紧学习了《原子能工程原理》、《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基础》、《核物理学》等有关书籍。

起初两年在北京做准备工作，并参加原子能所103工程的建设。那个工程由刘允斌（刘少奇长子）、冯锡璋（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和我三人为领导小组成员。过了几个月，西北工程要抓紧上马，而苏联又停派专家，于是将我调到第一分厂任副总工程师。1965年初工程竣工，试车投产，得出合格的产品，我的任务完成了。

1965年3月，我被调到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继续搞原子能的研究项目。1975年完成了重点科研项目“放射性气体的净化处理”，为此被授予“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

改革开放以后，到1979年我已经60岁，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将我从原子核所调到将要成立的环境化学研究所。不久又将这个单位移交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专门研究上海市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黄浦江、苏州河的黑臭问题。

1980年汪道涵任上海市长，他鼓励市建委和市财政局的负责人，利用世界银行

的低息贷款和赠款，与外国专家合作研究治理方案。环保局长任项目主管，我为中方研究人员领导小组组长，集中了环保局、市政工程局、市政设计院、同济大学等单位的专业人员与澳大利亚专家共二十多人，共同研究治理方案。我们决定以治理苏州河为第一期工程，该治理方案得到世界银行批准，给予贷款1亿美元和赠款约千万美元，由市政工程项目局主持设计施工。经过多年的检验证明，这个治理方案效果良好，黄浦江、苏州河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近年来，我经常闭目凝思，追忆过去，总结哪些是做得好的、对的，哪些是错的、遗憾的。人生轨迹是不能全然由自己来决定的，它经常受到时代的约束。

本人视力几近全盲，本文只凭记忆写作，无法查阅资料，因此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见谅。

2011年12月于上海

百年校庆有感

○汤惠如（1942化学）

每年校庆时，韶华往事忆。
物换星移逝，日见故人稀。
相顾无言对，欲语泪先垂。
满鬓清霜雪，风烛残年节。
学友复聚会，今生何惧悔。